

辽宁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近代教会幼稚园及其对我国幼儿教育的影响

姓名：包锋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教育史

指导教师：杨晓

20080501

摘要

本文以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传教士利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我国开办的教会幼稚园及其师资培训机构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法、个案分析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分析论证教会幼稚园在我国兴办的状态；教会幼稚师范学校；教会幼稚园的课程设置及教学方法；教会幼稚园的日常生活。提出教会幼稚园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幼儿教育的近代历程。

关键词：教会幼稚园；幼儿教育；中国近代

Abstract

The paper was targeted for church kindergarten and teacher training institutions run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unequal treaties in our country after the Opium War and adopted documents and case analysis as major research methods. It analyzed and demonstrated the state of running church kindergarten; church kindergarten normal school; th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methods of church kindergarten and the daily life of church kindergarten. The author proposed that church kindergarten affect China's modern history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Church Kindergarte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承诺：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论文中除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不包含他人和其他机构已经撰写或发表过的研究成果，其他同志的研究成果对本人的启示和所提供的帮助，均已在论文中做了明确的声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包锋 日期：2008年5月26日

学位论文版权的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辽宁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及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复印件或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文授权辽宁师范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并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使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包锋 指导教师签名：杨晓
日期：2008年5月26日

第 1 章 引言

1.1 问题提出

1840 年以前中国停留在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着船坚炮利的优势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与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在这些条约的保护下，各列强取得了包括在中国传教、办学等许多的特权。而随着洋枪样炮而一起涌入中国的传教士，不仅试图改变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还想用西方文化来代替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在中国的土地上兴办了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女学等，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于他们的信徒，在精神上控制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从而最终实现将中国变成其殖民地的意图。出现在中国近代社会的教会幼稚园，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也是幼稚园教育从西方向东方传播的一种结果。教会幼稚园的产生，同其它教会学校一样，也是帝国主义传教士出于传教的需要和考虑，在征服和占领的需要的刺激下产生的。它是帝国主义传教士侵犯中国教育主权，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的一种文化侵略活动，所以，无论是其建设性，还是其破坏性，都是巨大的，而目前国内鲜有专门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的成果，所以，出于这样的考虑，作者选择中国近代教会幼稚园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对中国近代教会幼稚园的整体性研究，分析教会幼稚园对中国近代幼儿教育产生的影响，对于我们反观历史所应持有的科学态度、树立正确的历史观、运用唯物史观解决问题应该坚持的立场等方面均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反思西方近代教会幼稚园在中国兴办的前提条件及其局限性，并反观我国当前幼儿教育借鉴外国先进教育的利弊得失，可能会为幼教工作者提供新的引进与本土化的思路。

1.2.2 学科意义

本研究的学科意义在于，目前我国近代教会幼稚园的专门研究并不多见，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教会幼稚园的基本存在状态的史料进行发掘和整理，可以更好的还原、认识这段历史，充实和完善教育史学科的内容体系。

1.2.3 现实意义

教育交流是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各民族、各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世界教育史，就是一部各民族教育相互交流、碰撞、融合和不断创新的历史。^[1]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交流是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始终要面对的问题和现实。人类社会进入 19 世纪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和侵略，教育交流活动十分活跃，一方面，西方殖民者借助战争作为掩护，对东亚等地区的国家进行侵略，并实施了一系列的教育侵略活动，这对于被侵略国家是一种被动的教育交流。另一方面，随着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完成，人类可以借助越来越先进的手段和交通工具来进行更大规模的各国间教育交流。二十世纪后半叶，教育交流在更大的层面上展开，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也进入了世界教育交流的大潮之中。据统计，截止到 2007 年 8 月，中国与世界上 178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签署了双边及多边教育合作与交流协议和施行计划 100 多项。^[2]中国同时与一些外国政府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建立了教育高层工作磋商机制，以及构建了区域性的教育合作与交流平台。近年来，双边和多边教育合作与交流持续呈现高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发展态势，并且更具务实的特点。^[3]如何科学的解读历史，反观历史，从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教育交流中吸取经验，总结教训，正确的评判历史上的教育交流活动，是我们深刻认识教育交流意义、总结教育交流规律、服务当代教育交流的有效途径。

1.3 相关概念界定

1.3.1 教会幼稚园

鸦片战争以后进入我国的主要有天主教和基督教两大教会，本文所搜集的资料，大多数的教会学校属于基督教会，同时也包括一部分天主教会所办，

以基督教会所办为主。本文所指的教会幼稚园不对天主教会与基督教会的幼稚园做区分研究。“教会幼稚园”在本文中所指代的是西方传教士不分派别，在鸦片战争以后到建国前在我国开办的一切幼稚机构，包括教会幼稚园和教会幼稚师范学校。

本文所研究的教会幼稚园的范围还界定在教会所办的正式教育单位。“慈善”事业，指的是鸦片战争以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帝国主义在中国办的孤儿院、慈幼院、育婴堂等，这类机构不属于教育单位，而是以“人道主义”为幌子的社会救济机构。帝国主义的“慈善”育婴机构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围之内。

1.3.2 幼儿教育

由袁运开，叶澜主编的《简明中小学教育词典》一书中，对“幼儿教育”做了如下的定义：幼儿教育是指3—7岁儿童的教育，属于学前教育的一个阶段。广义指家庭、教养机构和社会对幼儿实施的一切教育，狭义专指幼儿教育机构对幼儿进行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本文的幼儿教育概念是指包括幼儿教育和幼儿教育事业范畴之内的广义概念。

1.4 相关研究综述

教会学校是英、美等西方国家教会利用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中国开办的教育机构，其在中国存亡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实体，在中国近代教育史的研究中，一直有很多的专家学者的著作和学术论文提及和专门的论述。其中涉及到教会幼稚园的研究，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综述：

1.4.1 中国近代教会学校研究中有关教会幼稚园的研究

有关教会幼稚园的研究，兴起于改革开放之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总体来说，著作、学术论文中的作为部分章、段落的形式涉及的比较多，如高时良主编的《中国教会学校史》，吴梓明主编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李楚材主编的《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费正清主编的《剑桥晚清史》，栗洪武《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思潮》、卫道治《中外

教育交流史》、何晓夏，史静寰主编的《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田正平、肖朗主编的《中外教育交流史》、苏云峰所著《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陈景磐所著《中国近代教育史》，孙培青所著的《中国教育史》等。1974年出版的由 John K. Fairbank 编写，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由 K. S. Latourette 编写的 1929 年在纽约出版的《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由 Sidney A. Forsythe 著的哈佛大学出版社 1986 年出版的《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1895-1905》等。论文方面关于教会学校的研究更是十分的丰富，这里不一一列举。

总的来说，在关于教会学校中对于教会幼稚园部分的研究里，国内的学者大多数承认教会幼稚园同教会学校一样，作为西方教会办的一种教学机构，其有先进于中国当时幼儿教育的一面，主要表现在先进的教育思想、较为正规的办学模式、较为科学的幼儿教育方法、有益于教学和儿童身心的教学场所和设备等，在这一个问题上，西方的学者和中国的学者在观点上基本没有冲突。在教会幼稚园的性质问题上，国内学者基本上都认为教会幼稚园是一种西方侵华的附属物，其在华办学严重的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是对中国人民的意志的一种践踏，同时，认为教会幼稚园办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将在园的幼儿培养成为或者是虔诚的教徒，或者是培养成帝国主义的治华代理人，其本身具有严重的侵犯教育主权性、宗教性和侵略性。与国内学者观点不同的是，国外有许多的学者认为传教士来华办学就是一种很单纯的、出于将“上帝的福音”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友好、虔诚的目的办学的，教会幼稚园也不例外的，他们想通过教会幼稚园的办学，使儿童从小就接受他们认为的所谓的“先进宗教”，从而长大之后成为一名虔诚的、胸怀“上帝”的教徒。同时，西方一些研究中认为，有一部分传教士来华办学的目的还有将西方优秀的幼教思想传入中国的愿望，而本意上并没有侵略的意图。可以看出，国内、国外的学者研究的视角有所不同，国外的学者的观点的根本性错误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教会幼稚园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条件下进入中国的，即没有认识到一个最基本的前提性——教育的主权问题，所以，他们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是站不住脚的。在研究方法上，国内学者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文化传播的原理，对教会幼稚园做了一定的探讨。

1.4.2 中国幼儿教育史研究中有关教会幼稚园的研究

总体来说,我国关于学前教育包括学前教育史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的成果较少,着重研究传教士在中国兴办幼稚教育事业的研究成果更是鲜见。1979年,陈鹤琴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的书面发言中提出:“全面、系统地整理与总结‘五四’以来幼儿教育和儿童教育的实验和经验。”同年,钟昭华、唐淑、尹德新等来自南京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和陕西师范学院的学者,开始收集整理并着手编辑《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于1989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所选资料的范围,时限从原始社会开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该书所选资料,包括近代有关教会幼稚园文献的有关记载、近现代教育家的主要论述、政府颁布的法令规程、各种类型的学前教育机构的教育实施情况等,是我国第一部有关中国学前教育史的史料汇编。

与此同时,为了满足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学需要,有关高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编写中国学前教育史的专著,并相继出版。在这些学前教育史的著作当中,大多以单独的章节的形式来对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对中国幼儿教育事业的侵略,开办教会幼稚园等历史来进行的研究。据统计,1989年到现在,有十多种中国学前教育史研究的专著出版。其中包括:何晓夏主编的《简明中国学前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李定开编著的《中国学前教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唐淑、钟昭华编著的《中国学前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杜完成、王伦信著的《中国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喻本伐所著的《中国幼儿教育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出版),易慧清著的《中国近现代学前教育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唐淑、何晓夏主编的《学前教育史》(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王春燕著的《中国学前课程百年发展与变革的历史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廖其发《中国幼儿教育史》(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等,这些关于对中国学前教育近代过程的研究,大多数涉及到了教会幼稚园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探讨。

总体来说,学前教育史中关于教会幼稚园的研究大多数遵循一个模式,就是首先阐述教会幼稚园在中国开办的历史背景,即在鸦片战争的前提下进入,利用不平等的条约获得办学的特权,然后从教会幼稚园的设园宗旨、教育内容、教学方法、开办教会幼稚师范学校等方面对教会幼稚园的办学状况

进行大体的描述，然后，对教会幼稚园的侵略性、宗教性进行批判。主要的观点是，教会幼稚园作为西方国家在我国 19 世纪末出现到 20 世纪 50 年代消亡的一种特殊存在，严重的侵犯了我国的教育主权，在精神上奴化了我国人民，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思想侵略工具。同时，我国的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并没有否认教会幼稚园在办学过程中有些教育思想、教学手段，以及幼稚师范的培养，还是优于当时中国的幼儿教育，对中国的幼儿教育的近代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研究的方法上，中国学前教育史的成果中大多数采用的是史料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史料的分析，对教会幼稚园进行了阐述，对其历史地位、是非功过进行了评价。研究的视角上，以历史发展为视角，教会幼稚园是中国学前教育史上的一段不可或缺的历史，在中国学前教育史上留下了它历史的印记，所以，作为中国学前教育史的一部分，对于教会幼稚园的研究是必不可缺的。

1.4.3 相关研究的特点及存在的不足

1.4.3.1 相关研究从属于中国近代教会学校，而专门研究较少

对于教会幼稚园的研究，相关的著作和论文都比较多，专著如何晓夏、史静寰《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朱维铮《基督教与近代文化》、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论文方面比如说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福建教会教育及其对福建教育现代化的影响”，陈章国“试论教会学校和上海教育近代化的关系”，高乐才“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评析”，“民国时期基督教在广州的办学活动及影响”，唐全贞“外国学前教育引进与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学前教育变革”，白锦表“影响浙江教育近代化的因素与浙江近代教育的特点”，郑生勇“教会学校对浙江教育近代化的影响”，杨齐福“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吴洪成“传教士与中国教育近代化”，赵启重“教会学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王伦信“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启动与基督教教育策略的调整”，张文举“基督教近代入华作用及性质的再认识”，王冬凌“试论中国近现代教会学校的发展轨迹及特点”，李勇忠、李春华“帝国主义对华的侵略与教会学校的两重性”，石磊“教会学校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杨

齐福“教会学校的兴起与近代中国的教育改革”，赵启重“教会学校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王红信“简论中国近代教会学校”，洪厚情、文华锋“近代教会学校的性质和影响”，刘晓华，贺燕丽“略谈教会学校对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影响”，田景正，张建国“略述近代以来中国学前教育团体的贡献及启示”，张传燧、田景正、路雪“外国学前教育引进与20世纪上半期中国学前教育变革”，刘小芹、刘曙光“西学东渐与中国学前教育由家庭化向社会化的转变”等。从文章的内容来分析，这些研究成果的内容仅仅把视线放在某一个地区之内，关注教会幼稚园也是将其纳入到整个教会学校的体系当中，而并未作为专题研究。由于精力有限，对于这部分相关的著作，比如各地史志，除了对近代教会势力侵入较早的福建省、广东省，以及对东北地区的史志做了一些查阅工作，对其他地区的史志并没有做更多深入的查阅。

1.4.3.2 中国幼儿教育史的研究中大多涉及教会幼稚园，但关于中国近代教会幼稚园的办学实态研究及评价略显不足

教会幼稚园是英、美等西方国家教会为在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而建立的，它的兴起和发展是以外国资本主义对华侵略为条件和背景的，因而它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总是与侵略者的殖民扩张活动联系在一起。所以教会幼稚园自觉或不自觉地完成外国资本主义侵华的一个组成部分，基于此，尽管兴办教育是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建国以来到“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以后，研究尚处初级阶段，对教会幼稚园这一课题的研究甚少，仅在若干专著和论文中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而未有专题论及。对近代教会幼稚园在西学东渐这一历史进程中的许多贡献，国内很少从正面来肯定其积极作用，即使谈到也不敢轻易涉猎，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近代西方传教士来华是以战争下的坚船利炮为先导，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进入中国。而导致史学界在研究教会学校对中国近代教育所产生的影响时，往往以重在“揭露其罪行”为立足点，用“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究、评价这一问题，对传教士们活动的客观内容与社会历史效果，缺乏冷静的个案研究和具体分析。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史学家和教育理论工作者摆正了思想态度，从史实出发，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理论依据，客观、冷静、深入的探讨研究了教会幼稚园在华历史的是非功过问题，一般结论认为，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51年教会幼稚园在中国大陆的消失，它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

的发展，在中国幼儿教育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正如学者沈体兰所指出的那样，基督教学校在现代中国教育界中是处于一个先进者的地位，这是无可怀疑的。

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专著，书中用了较多的笔墨去披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华的罪行，而对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的积极一面及可资借鉴之处却着墨甚少，使人感到稍嫌分量不足。史静寰著的《教会教育与中国近代教育》等将教会学校与教会教育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书籍，虽然用大量的笔墨对教会学校对中国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是对教会幼稚园的研究却略显单薄。何晓夏主编的《简明中国学前教育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李定开编著的《中国学前教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唐淑与钟昭华编著的《中国学前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杜宪成、王伦信著的《中国幼儿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作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乃至当今国内研究中国学前教育史最高水平的专著，对于教会幼稚园方面没有做很深入的研究。在查阅相关研究过程中，本人还没有发现有关教会幼稚园的专门研究，因此，想进行一次初探。

1.5 理论基础与方法

1.5.1 理论依据

1.5.1.1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观是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和见解。在历史唯物主义诞生以前，人们总是从神的意志、卓越人物的思想或某种隐秘的理性，即从某种精神因素出发去解释历史事件，说明历史的发展，其结果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亦称唯物史观。本文在研究1840鸦片战争爆发后到解放后，教会幼稚园在中国兴衰的始末这一历史过程，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做到对其公正、客观的研究与评判。

1.5.1.2 文化传播学理论

文化传播是人们社会交往活动过程产生于民族、国家、社区、群体及所有人人与人之间共存关系之内的一种文化互动现象。文化传播指的是当某种文化的成员发出信息给另一个文化的成员接受时，而形成的一种传播活动，有主动接受和被动接受之分。本文所运用的理论基础有文化传播学中的“维模原理”、“进化原理”及“文化融合原理”。

文化的“维模功能”是社会文化的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在文化传播中，维模功能使文化圈对外来文化起到选择作用和自我保护作用，当外来文化有利于原有文化模式的时候，便容易被接受，并被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营养为原有文化所吸收；如果外来文化对原有文化模式有破坏性时，维模功能就会起到“守门人”的作用，拒绝外来文化的侵入。

“进化原理”指的是，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主流在不断的前进，文化发展也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样的法则，文化的“优”指相对于别的文化较为“文明”，文化质量较高的文化，而“劣”是指封闭的、落后的、愚昧的文化。比较来说，文明程度越高的文化就越容易扩散，这种生物进化原理在文化传播上也被称为优劣扩散原理。

“文化融合原理”是指两种以上不同文化传播后发生的吸收、认同、复合的现象，文化融合是文化传播的结果。

中国教育近代化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环境里开始的，是在即痛恨列强又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教育制度的矛盾心态中发展的。从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在异域异质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总是由优势文化(或称强势文化)向劣势文化(或称弱势文化)进行渗透，以影响弱势文化。同时，弱势文化也对优势文化起自觉或不自觉的反作用。就近代教会办幼稚园教育思想与近代中国固有封建传统文化统治下的幼儿教育思想比较而言，教会幼稚园本身所代表的文明(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文化，毕竟是新兴的、进步的东西，是较高的优势文化。因此，尽管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优秀的幼儿教育思想，但在鸦片战争后教会幼稚园传入，对当时传统幼儿教育思想无疑是一种挑战和刺激。

1.5.2 研究方法

1.5.2.1 文献资料研究法

通过全面搜集、鉴别、整理国内外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并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教会幼稚园在近代中国幼儿教育过程中的客观全面的认识，以及分析教会幼稚园进入我国对当时幼儿教育的影响。

1.5.2.2 个案研究

通过具体对某一地区、某一教会幼稚园的个案研究，比如史料中可以查到的几所记录较为详细的典型的教会幼稚园的研究，可以较为详细的了解和把握教会幼稚园的一些具体特点，从而增强本文的说服力。

第2章 中国近代教会幼稚园的兴办

2.1 教会幼稚园在我国兴办的历史背景

传教士在鸦片战争之前，受到了中国政府的抵制，同时也受到普通民众的冷遇，但是“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及保护，西方传教士不辞辛苦，不远万里再次登上中国的土地，因为他们在华的活动受到了保护，所以他们介绍、传播西学的方式、态度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是创办教会学校以其为阵地，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世俗文化。”^[4]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为基督教在华传播活动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传播宗教与开办教会学校堂而皇之的登上了中国的土地。

1844年，美国与清政府签订《中美望厦条约》，包含了建立礼拜堂的条文，规定：“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院、礼拜堂及殡葬之处……”。^[5]

1845年，在《中法黄埔条约》中进一步规定：“佛兰西人亦一体可以建造礼拜堂、医人院、国急院、学房……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6]这样，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便通过获得在中国建教堂、传教、办学校的权利。欧美列强在军事侵略、经济掠夺的同时，“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7]。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与清朝政府新签或修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又进一步夺取了自由进入中国内地传教、通商、租买土地建造教堂、学校等特权。

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中，担手翻译的传教士私自在中文本上加进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8]的内容。

1868年，《中美续增条约》，《薄安臣条约》中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地方设学塾”^[9]。由于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教会学校在中国不仅合法化，而且普遍化，并随之由原来的五个通商口岸发展到内地，数量迅速增加。

从帝国主义在华办教育的初衷来看，宗教传播本身就隐含着种族中心主

义和征服其他民族的心理背景，近代西方传教士的东来，同样是以教会和西方的利益为宗旨。^[10]帝国主义在华办教育，其目的是明显的，就是要通过这一手段为其实现意识形态的渗透，培养治华的代理人并使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西化，传教士们自己也承认教会办学的重要意义，狄考文批评过去西方传教士不重视教育侵略活动，是“错误”的。因为在此之前，来华传教士所办的教育，都是中等以下成程度的学校，其作用也只限于让入学的学生读圣经和学习一些基督教教义，使他们有能力钻研教义，加深信仰，仅仅是一项训练教民的工作。

19世纪80年代，外国教会在中国沿海如福州、宁波等地开始办幼儿教育机构，以后教会办的幼稚园逐渐增多。根据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所著《五大洲女俗通考》第十集下卷所载，当时外国在中国设的幼教机构“有小孩察物学堂（即幼稚园，作者注）六所，学生一百九十四人（男女各半）”^[11]，随后，在福州、宁波、上海，北平等地都有外国人办的幼稚园出现。

2.2 教会幼稚园在我国的兴办实态

1913年，基督教全国会议议案中规定，各地教堂都要设立幼稚园，教会幼稚园数目大增。根据1921—1922年中华基督教教育团的报告，基督教教会学校在“五四”运动前夕共7382所，其中教会办幼稚园139所。当时，“调查团”对这种状况很不满意，认为：“幼稚园之稀少，实使本调查会不胜失望。华人今实急需幼稚园之教育，盖彼旧式之小学除养成学生的容受性外，对于学生教育上之情状，殊不知问。若设幼稚园，则在园儿童必以自动之努力，有所作为，然后由教员之指导而助其成功”，所以“调查会”建议：中国应多设幼稚园；幼稚园设在小学之内，如幼儿人数过多，并且有充足的资助，则应令办独立的幼稚园。

“调查团”的这一建议很快就奏效，南京一女师1924年的调查，全国有幼稚园190所，其中教会办156所，幼稚生5940人，占全国总数的80%。^[12]

教会幼稚园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开办，全国除了极少数的省区之外，大多数地区都有教会幼稚园。这些教会兴办的幼稚园，带来了一些当时西方先进的幼稚园办学模式、幼儿教育思想、幼稚园管理方法，这为中国幼儿教育注入了西方近代教育思想的因子。

2.2.1 教会幼稚园被纳入中国近代教会教育体系之中

1890年，基督教传教士召开第二次全国性大会，进一步明确了传教士利用教育作为侵略工具的重点，此后，“学校和教科书委员会”不能适应其传教的进一步的需求，于1890年召开了由445名传教士推选出的37人组成的“中国教育会”。中国教育会及其附设的“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参事会”成立后，教会学校有了明显的发展，并逐渐形成由幼儿园、小学、中学到大学的一个完整的教会教育系统。各国差会不断派遣传教士来华增办各类学校，对于幼儿教育尤为一些女传教士的重视。麦美德女士曾讲“基督教办学的等级，宜从幼儿园以至大学”。

1915年“中国教育会”改称为“中华基督教教育会”（1931年国民党政府颁布教育会法时，又将其改名为“中华基督教教育协会”。该协会成立以后，1921年2月，英美派以芝加哥大学前校长巴顿为团长的“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调查团”来华对其传教工作进行了调查。1921年11月提交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根据调查团统计，教会在中国所办的学校，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系统：

表1 1911年教会在中国的办学状况

级别	学校数目	类别	在校人数
幼儿园	139所	学生	4244人
小学	6599所	学生	184481人
中学	291所	学生	15213人
师范	48所	学生	612人
大学	16所	学生	2017人
法学院	1所	学生	27人
医学院	10所	学生	563人
护士学校	106所	学生	1380人
盲童学校	29所	学生	794人
聋哑学校	5所	学生	60人
孤儿院	25所	学生	1733人
圣经学校	100所	学生	2659人
神学院	13所	学生	391人
共计	7382所	学生	214174人

传教士深知，要想使中国的民众彻底的从心底接受基督教，信服基督教教义，必须从儿童教育开始实行基督教教育，所以，他们没有放松对教会幼稚园的管理与紧抓，将其纳入到整个教会教育系统当中。因为“欲造民主国国民之根基，除幼稚园外，无他术也；欲使街巷顽童、家中劣子成为安分之小国民，除幼稚园外，亦无他术也”^[13]

2.2.2 教会幼稚园师资培训机构——教会幼稚师范学校

为了在中国兴办幼稚园，教会着力于开办幼稚师资培养机构。传教士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至少应有幼稚园师范养成学校，专门养育幼稚园人才。为女子者，无论路途多么辽远，都应送之入此等学校。若有中国布道者不信幼稚园之力，亦应使其再研究此问题，则幼稚园自能发达矣”^[14]

毓英女校是娒标礼、娒西利姐妹1869年创办的一所女校，该校曾培养了最早的一批幼稚园教师。^[15]该校的幼稚园前身是福州保生堂附设幼稚园，是这批幼稚园教师的实习场所。^[16]

1892年，美国监理公会女传教士海淑德，在上海办了幼稚园师资培训班，每周六下午上课，收学生20名。

一般认为我国第一所独立幼稚师范是1898年2月由英国长老会在厦门创办的幼稚园师资班（后发展为怀德幼稚师范学校——即现在厦门市日光幼儿园），1912年正式取名为怀德幼稚师范学校）。1904年美国长老会在岭南大学所设的高等幼稚师范专科部，1905年美国公理会、伦敦会、长老会在北京协和女子大学所设的高等幼稚师范专科部，1906年美国监理会帅洁贞在浙江吴兴北城所设的湖郡女塾幼稚园，1914年监理会金振声在苏州所设的幼稚园及幼稚师范科（幼稚师范科后合并于景海女子师范学校），1915年美国南长老会、北长老会、浸礼会合组而成的杭州弘道女校所设的幼师部，1915年美国美以美会、布道会在福州女中所设的幼稚园师范科，1917年美国监理会创办的苏州景海幼稚师范等。1913年基督教会全国大会议案提出，教会要设立幼稚园，同时设立幼稚师范学校，生源可以在招收教内的人员之外招收一部分教外的学生。这些幼稚师范学校都为教会所办，重视宗教教育与英文教学，有较为完备的教学设备。如景海幼稚师范学校课程，详见下表：

表2 景海幼稚师范学校课程计划表^[17]

学 科 目	年 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英文	20	10	10
国文	12	12	12
社会问题	6		
宗教学	4	4	4
体操	2	2	2
生理及卫生	3		
生物学	3		
家政学	2	儿童保护法 1	2
音乐	2		
琴学	(1) 随意科	1	1
心理		3	
音乐教法		2	
唱歌		1	
美艺		2	2
故事		1	
幼稚与国民歌		1	
国文教法		2	
圣道教法			2
学校管理法			1
近世教育史			3
实习		10	15
启智用具 教法		1	
秩序法			2
实习商榷			1
幼稚教法			2
学分总数	54	53	59

从这个学校所设的课程看，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适应外国在华办教学的需要，如英文占的学分最多，一年级各科总分为 54，英语占 20，二年级全

年各科总分 53，英语占 10，三年级各科总分为 59，英语占 10。三年供学 25 门课，166 学分，外语就占 40 学分，几乎占去总课时的 1/4。属于这类的还有社会问题、宗教法、圣道教法。这些课程，直接为资本主义国家传布基督精神，培养顺民服务。第二类是文化课，如国文、体育、生理及卫生、生物学、音乐等。第三类是专业课，如心理学、学校管理法、实习、幼稚教法、启智用具教法等。设课的基本精神是贯彻基督教教育宗旨，有助于培养“基督化的人格”。所以宗教课占很大比例，所开课程中宗教课就有《宗教学》、《圣经》、《圣教史记》、《圣道教法》、《主日学校教授法》等，占总学分的三分之一。《宗教学》要连开三年，共有十二学分。教会要求教师在讲授宗教学时，“当用优等文字注释、讲解。无取冗长，以能引人思索为善，且宜多引中国喻言，以期适合华人之用”。

教会办的幼稚师范，一般规模比较小，毕业生人数不多。如杭州弘道女学幼稚师范科历届毕业生人数，少的年份（如 1918、1920）只有一名，多的年份（1931、1933、1935）也不过 10 名。从 1917 年至 1942 年，共有十九届毕业生，总数不过 108 人。^[18]

2.2.3 教会幼稚园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方法

2.2.3.1 教会幼稚园的课程设置

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大多数以传教为主旨，纳入到宗教教育的轨道，同时开设一定的其他课程。主要包括：1. 宗教课 包括走朝会圈、唱赞美诗、祈祷歌、感谢歌、讲宗教故事等。2. 外语课 主要是练习口语、会话。3. 音乐课 包括听琴、唱歌、节奏动作三项，儿童所用教具一般为钢琴和风琴。4. 游戏课 凡是幼儿活动，包括自发性活动，都属于此活动。5. 故事课 包含得知识、学语言、增欣赏三个目的的故事，其中以增强欣赏为目的的故事为主，其他二者结合为辅。6. 谈话课 本科当出于自然，既有归于他科者，也有独立成科者，教师可按教育目的灵活进行。7. 图画课 注重儿童的坐姿和执笔等基本动作，而不重于临帖之真否，形状之肖否。8. 手工课 包括纸工、泥工、缝纫，要求儿童自己动手。9. 自然常识课 以儿童所能接触到的动植物、四时变异、家庭卫生、宗教风俗礼节为内容。10. 算术课 包括识数、计算。教会幼稚园在具体组织教学活动时，各科内容是交互进行的，并且经常与宗教活动

相配合，使儿童从小形成崇拜上帝、服从基督的意识。

以美国传教士黎曼顾于 1920 年开办的上海崇德女子中学附属幼稚园为例，其开设了识字游戏、户外游戏、美术工艺、音乐、故事等课程。这对于传统的蒙学教育来说，无疑是一种全新的模式。根据《大上海教育》杂志第一卷第二期刊载，这所幼稚园的课程日志是这样的：

表 3 一所教会幼稚园课程设置表

上午 9:00—11:00	幼儿课程项目	下午 1:30—3:00	幼儿课程项目
8:30—9:00	入园	1:15—1:30	入园
9:00—9:10	朝会（清洁检查）	1:30—1:45	睡觉
9:10—9:40	作业活动（包括恩物、美术、工艺）	1:45—2:10	识字游戏
9:40—9:50	批评已成工作	2:10—2:30	户外游戏
9:50—10:00	解手	2:30—2:40	点心
10:00—10:30	户外游戏	2:40—2:50	日记
10:30—10:45	静息	2:50—3:00	游戏
10:45—11:10	音乐（律动、节奏在 内）	3:00—3:30	散学
11:10—11:20	故事（儿歌、故事表 演在内）		
11:20—11:30	游戏		

从这份教会幼稚园的活动安排分析不难看出，该幼稚园的课程整个安排较为合理，把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照顾儿童较为全面的发展与游戏穿插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作业活动已包含了当时先进的幼教专家福禄贝尔的教育主张以及为儿童亲身设计的“恩物”，还有最新的幼儿律动活动。这些课程内容的设置在一定程度上传播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丰富了学生的音乐、美术知识，另外，由外国人办的教会幼稚园中，儿童会在无形的影响与有形的教师国别中了解西方的历史、地理知识。

再以福州毓英幼稚园为例，早期，以福禄倍尔的教育思想为指导，课程有宗教晨会、唱歌、游戏、故事、手工、数数等。有四个特点^[19]：

1. 以宗教教育为中心内容。实施“爱主”启蒙教育。每日上午举行宗教

晨会，星期天全体幼稚生排队到仓山前天安堂做“礼拜”。住在保生堂内的弃儿，三餐要“谢饭”，晚上要“忏悔”，宗教气氛极浓。

2. 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形式。仿效欧美模式，主张自由发展，无固定课表。除宗教晨会及礼拜每个幼稚生均需参加外，其余时间不分节，每个教师带八九个幼儿，有时在室内唱歌、折纸、玩积木、看图片，有时到花园自由游戏。

3. 重视音乐熏陶。园内琴声悠扬，教师常通过音乐指导幼儿活动，还编了不少儿童歌曲，也有福州方言儿歌。

4. 较重视体育和卫生保健。1893年后活动室面积较大，卫生整洁，并备有小型体操器材。室外有沙坑、滑梯、秋千等，幼儿可自选体育游戏。每日教师带领幼儿演唱《拍掌歌》，作幼儿体操动作。仓山岭后妇孺医院为幼儿进行防疫注射及医疗服务。

在幼生与园友方面，毓英幼稚园的保生堂附设幼稚园初期，规模很小，生无定数，有几个3岁以上弃儿就有几个幼稚生，不收堂外幼儿。1893年后，扩大保教对象，除弃儿外“兼收少数教友子女”，19世纪末“约有幼稚生五六十人”成为寄宿制兼全日制幼稚园。

该园重视训练幼儿生活自理能力，幼稚生“一般劳动、语言、音乐都发展较好”，女孩七八岁进毓英女校。1888至1909年毓英两等小学“毕业生117人”，多数在教会机构工作，内“幼稚园教师8人、小学教师40人、公立学校教师5人、留母校工作12人、传道人妻23人、医界11人”其中不少是幼稚园的园友。少数园友经教会中学毕业，进京、津、沪教会大学，或到英、美、日等国留学，事业颇有成就。我国第一代医学寄生虫学专家林梁城教授，福州协和幼稚师范华人校长、国立幼专训育组长黄世明教授(女)，受山东泰州人民崇敬的第一位女西医吴淑琳等，19世纪末或20世纪初都曾在该幼稚园受启蒙教育。

另外，在幼稚园的教材方面，有配合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下编写的教科书，如：《教会三字经》、《格致读本》、《物理引蒙》、《耶稣事略五字经》、《最新地文图志》、《儿童乐园》、《儿童故事》、《童男须知》、《童女须知》、《物理引蒙》等幼稚园教材。有评价说：“《幼稚园与初等小学诗歌》(1915年) E·S·Stelle 编 上海美华书馆印，此书内容多为教会所用之诗歌，但未附有手指歌玩法式样，及圈上游戏歌玩法，颇有可取。”^[20]

2.2.3.2 教会幼稚园的教学方法

当时教会幼稚园采用的教学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美国的设计教学法，一是德国福禄贝尔教学法。设计教学法是依据美国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和“做中学”的学说创行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强调从实际生活环境中提出学习目的，制定达到目的的工作计划，在自然状态下，运用具体材料，通过儿童自身活动完成这项工作，最后检查儿童活动的效果。整个活动，教师处于从旁指导的地位。当时，美国传教士所办的幼稚园多用设计教学方法。如苏州景海幼稚园，这是一所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所创办的幼师附属幼稚园，幼儿的全部活动都按美国幼稚园的方式去组织，教学上主要采用设计教学法。他们的校长曾回忆：

“幼儿园小朋友的活动。当然根据美国幼稚园的一套，特别采用一本很厚的美国出版的《幼稚教育》和《幼儿教育月刊》。儿童在园内依据杜威的‘儿童个性自由发展’的主张，任他们随便活动。例如，让他们在画板上自由乱涂（几只立地画板上别上大张白报纸，装上一大排有不同颜色的玻璃瓶，并供有画笔）。手工活动课，也是用泥土或油灰自由地捏玩。其它活动课，同样也是鼓励他们自由玩弄各种玩具或剪贴图片（取材于美国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 Good House Keeping等）。”^[21]

由于这所幼儿园从建筑、设备到活动的内容、方法都很新颖，所以对中国人很有吸引力。每年春秋两季，全国各地有许多人前去参观、学习。就这样，美国化的幼儿教育内容和方法，“依葫芦画瓢”抄袭各地，影响全国

教会幼稚园中所用的福禄贝尔教学法主要体现在教会幼稚园中儿童游戏中的“恩物”的应用。张雪门曾对教会幼稚园采用福禄贝尔教学法进行了描述，他说：“就恩物来说，全体共二十种，从第一种到第十种叫做游戏的恩物，从第十一种到第二十种叫做手工的恩物。游戏的恩物，从六球开始，有色板、筷子，有铜环插木板，从体到面，从面到线，从线到点；手工的恩物，从刺孔起，有绣纸、画纸、剪纸、贴纸、折纸、泥工，复从点到线，从线到面，从面到体。”^[22]

2.2.4 教会幼稚园在园儿童的宗教生活

张雪门曾将教会幼稚园的生活概括为宗教本位的生活，具体描述如下：

1. 设备方面

“以宗教为本位的幼稚园大多设在教堂的附近。建筑即使不完全西式，也是近乎西式的。所用的桌子、椅子，都很小巧、很精致。四周的墙，挂有耶稣的像，或是耶稣的圣迹，或者有一个圣母的像。各种玩具，差不多都是外国来的。”^[23]

2. 儿童在校情形

“这些幼稚园的小孩，无论是在上课或是下课的时候，总是活活泼泼的，每天早晨聚会的时候，先要做祷告，或是讲一段《圣经》，吃茶点的时候，唱一段赞美诗，到放学的时候，再唱一段感谢诗。每到圣诞节的时候，不但彼此送礼，而且有时还替穷人捐款开游艺会卖票。”^[24]

3. 教学方面

“讲圣经的故事，有《母游戏》——福祿贝尔著作之一及各种恩物。教学的方法，当然不像以造成士大夫为目标的幼稚教育那么勉强，随时启发，随时指导，然而它的教育目标，在养成基督徒。”^[25]“闻馨为使儿童认识上帝的徽旨，不要假意为善。”^[26]

“这种伟大的爱，只有宗教徒可以担当。而这种爱的行为，在教会办的幼稚园里，如使儿童向人要东西说“请”、说“谢”，捐款给穷人，以及爱父母、爱家人、爱动物等，在游戏中全可以见到。教会办的幼稚园，是否真能养成基督教徒，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其教育方面，总是以基督教徒为标准。”^[27]可以看出，教会幼稚园在园舍建筑、园舍布置、教具、教学方法、教育目的及日常的生活等方面当中，处处渗透着宗教传播的意图，在于将幼儿从小就接受西方的宗教观念。

2.2.5 教会幼稚园的园舍及设备

教会幼稚园，大都设在教堂或教堂附近，园舍建筑一般是西式或接近西式的。比较标准的如苏州景海女子师范附设的培本幼稚园（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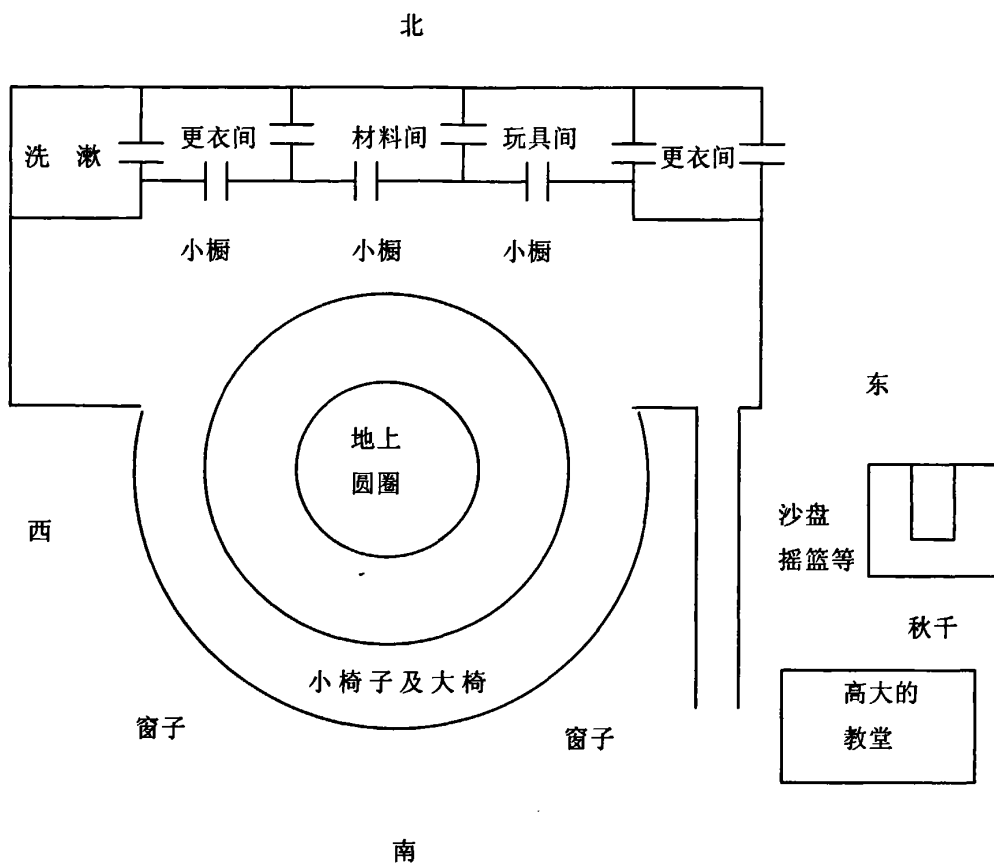


图1 苏州景海女子师范附设培本幼稚园房舍

该园房舍不多、亦不大，但每间都很适用，如课室之大，漱洗室、玩具室等都能处处得宜。至于室内设备也是很有讲究的。如玻璃窗之多，使通室光明；窗槛之底，虽三岁儿童亦能开关；墙之周围亦处处利用，面盆而外，且有浴盆、牙刷等。这些都是为上午免费班学生来园后使用的。各室壁上，都有图画，其内容都很得体。如洗浴间的洗浴图、课室中的美术图及各种教育图，都很适宜，但是都取材于西方。一位景海幼师校长回顾说：

“我们的幼稚园设备，从漆着淡粉红、淡绿色、淡紫色、奶油色等等的小桌椅到立地画板、沙盘、大小积木、荡船、滑梯、转椅、车马、洋娃娃和洋娃娃住的一套西式公寓木房子，完全按照美国方式制造的。因为设备好，所以当地的大地主、银行、海关的高级职员、厂长、富商、绅士等等都争着把

自己的小孩子送入景海幼稚园，以表阔气。”^[28]苏州景海幼稚园设备是如此，一般教会幼稚园也大体都是这样，这些都属一般设备。

在教学活动方面的设备，分类就更多些。如游戏设备、手工设备、图画设备、表演设备、音乐设备、阅读设备、识数设备、常识设备、图书设备等。一般教会幼稚园，尤其经费充足些的幼稚园，上述设备都比较齐全，并且多从国外购置。

2.2.6 教会幼稚园在园儿童的日常生活

关于教会幼稚园的日常生活的状态的感受和描述，主要是由一些参观教会幼稚园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其后的回忆中体现的。张雪门的“幼稚教育五十年”一文中曾经写到他本人于民国八年（1919年）参观幼稚园时看到的其中一所教会办幼稚园时的感慨。文中写到“民国八年，宁波旧府属有一个江苏教育参观团的组织，我也参加了。我们到过上海、南通、无锡、苏州、南京等地方。”^[29]“在苏州景海女学幼稚园里所见到的是另一种精彩的表演。一位女教师弹琴，一位女教师带队。孩子们脚步都合着琴声的节拍，站成了朝会圈。闭上了小眼睛，又唱了一首大家平安歌。不论做游戏或讲故事，随着动作的变更，都用着跳步，一忽儿散开，一忽儿又合在一起。真好比一首美丽的诗，又活泼，又有韵律。”^[30]

1917年出版的《环球》杂志第二卷第二期有这样一篇关于参观上海一所名为“培真幼稚园”的文章——“上海培真幼稚园参观记”，文章对作者所见的教会幼稚园做了这样的描述：“培真幼稚园幼稚生，前在寰球中国学生会表演各种形式，因其间精灵活泼，惹起吾研究之心。归而作书，以参观事请园主复书许之，昨日遂往及门见幼稚生相戏于草场上，意兴至得并呈一种极活泼之象，园主肃容入曰，冬日可爱，休息时间使诸生至草场游戏，以感受日光，俄而上课，遂引视各种作法，均寓有深意，述之如下：

一曰实物教授：该园简单模型多种，农工商俱有，教授时以各种器具之实用说明之，使儿童知生活之大要。

二曰机工教授：使儿童以纸制成种种形体，如梳子刷子之类，说明其用处，以开发儿童之心思。

一是美术教授：如简单书画辨别颜色，及唱歌之类，意在启发儿童爱美

之心，而增进其乐趣。一是作法教授：种种应对进退之礼仪，及有趣味之谈话，使儿童有极规则之仪容，极快乐之态度。以上各种教授皆以自动为主，以切近为主，自动故儿童能举止活泼而有规则，切近故儿童对于事物易起观念，且甚精灵，诸教习谆谆善教，亲爱若家人，故其收效益大也。”^[31]

可以看出，教会幼稚园的儿童日常生活较为活泼、轻松，师生关系和谐、民主，游戏已经被教会幼稚园作为日常活动内容所应用。

第3章 教会幼稚园对我国幼儿教育的影响

3.1 教会幼稚园使我国幼儿教育涂上宗教的色彩

教会幼稚园在课程设置、园所布置等方面，都体现了传教目的。张雪门深刻地批判了教会幼稚园难以克服的宗教性质对儿童心灵的腐蚀。

“教会立的幼稚园里的保姆，如果报这种态度去教训孩子，我是不反对的，正如我不反对神话教授的用意一样。可是事实还是事实，她们拿的是教会的钱，吃的是教会的饭，哪里可以不给教会尽职，然而这个职务，确实是教会的职务，不是教育的职务，她们愿意给教会造成一批教徒的心比替社会造成一批健全分子的心热烈，所以她们是为她们的教会尽职，不是为教育服务，是为的宗教，不是为的孩子，所以她们喜欢谈耶和华造亚当夏娃，不准孩子说猴子变人的故事。有知识的家庭，因之不肯送子弟到那边去，无宗教的家长，自也不肯送子弟到那边。她们所收的，大半是她们教会里的徒子徒孙，将永远得不到国中社会深切的同情；虽然她们有的是美丽的教室、巧小的桌椅、精致的恩物和较有训练的保姆。要想改良，除非舍宗教的狭义而为广义，略宗教的形式而取其精神，然而这哪里能够！”^[32]张雪门认为教会幼稚园的办学目的是就推广基督教的势力，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宗教本位的幼稚教育。

传教士也不否认教会教育的这一目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就是想把西方的宗教传入中国，教会学校的开办充当了这一目的的工具。而幼儿教育的宗旨，自然也离不开这个总目标，尤其重视对幼儿心灵的熏陶，使其接受基督精神，正如麦女士所言：“欲定民主国民之根基，除幼稚园外，无他求也；欲使街巷顽童、家中劣子，成为安分守己之小国民，除幼稚园外，亦无他术能收效若是之速也。”^[33]幼稚园通过教会来组织，带有很强的宗教色彩，使幼儿从小信奉基督教，长大后服服帖帖受侵略者的摆布。

3.2 教会幼稚师范学校对我国幼儿教育的影响

清末我国幼稚师范教育主要受日本影响。民国初年，由于战乱，政府无暇顾及教育，很少重视幼教师资的培养。“五四”运动后，教会办的幼稚师范学校规模越来越大，对中国幼儿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舒新城在“中国幼稚教育小史”一文中曾讲到，幼稚园中的“教师之来源则大半为教会女子师范所设之保姆班所养成，本国女子师范所造就者甚少。”^[34]

张雪门说：“至少可以见到两种趋势：1. 由日本教师教授的学校，在今年早已消灭了，就是参酌办的保姆科也一校都没有，那么现在养成师资的地方，只有教会是唯一的路径。2. 保姆的人才，由非教会养成的，既一天比一天缺乏，而有限的人才，更大多数（或者可说是全数）埋没于家庭里，自然变成更加稀少；他方面由教会养成的，一年一年的继续毕业，又正值社会上需要的时候，自然全国的幼稚园，将逐渐归入他们的领域了。”^[35]

可见，当时中国师范学校培养的幼师极少，多数依赖教会幼稚师范培养。著名幼儿教育专家张宗麟，于1935年发表的《幼稚园的演变史》一文中说：“当时的基督教所主持的几所保姆班，如杭州的弘道、苏州的景海、北京的燕京、长沙的雅礼、福州的协和等校毕业生，对于技能的训练，都还能练习。他们所办的幼稚园小巧玲珑，虽然宗教色彩太浓，但处处给参观者以愉快。而模仿福氏、蒙氏以及美国新方法，也还能做到几分。”^[36]

教会办的幼稚师范越来越多，教会幼稚师范科毕业的学生越来越多的服务于当时中国的幼教机构，造成了当时幼稚教育严重的“洋化”倾向，幼稚教育存在严重的殖民色彩。教会幼稚园设课的基本精神是贯彻基督教教育宗旨，有助于培养“基督化的人格”。所以宗教课占很大比例，如景海幼师，所开课程中宗教课就有《宗教学》、《圣经》、《圣教史记》、《圣道教法》、《主日学校教授法》等，占总学分的1/3。《宗教学》要连开3年，共有12学分。教会要求教师在讲授宗教学时，当用优等文字注释、讲解。无取冗长，以能引人思索为善，且宜多引中国喻言，以期适合华人之用。

面对这种现状，幼儿教育家张宗麟向社会呼吁“停办各教会设立的幼稚师范”，他说“停办各教会设立的幼稚师范。各国的教育条例没有外国人设立师范的。我国教会学校，都受条约的保护，所以自小学以至大学，几乎全学制系统里的学校都有，这种办法，当然非我国人民之福。其中幼稚师范尤其占势力，因为她们是独一无二的幼稚师范，全国的幼稚园教师几乎都是出其门下。她们的课程，差不多都是像讨论第一个问题里所举的课程实例。这种以传教为主体的师范教育，在民主国教育制度之下，万不能容留的。所以在振兴我国幼稚教育的消极方面，就是停办教会立的幼稚师范。”^[37]后经过中国

教育界以及幼教界的知识分子的努力，终于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单独设立的公立幼稚师范——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

3.3 教会幼稚园对其所在地区幼儿教育的影响

教会创办教会幼稚园，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其办学所在地的受教育儿童的范围，推动了当地新式幼儿教育的发展。下面，以我国较早出现教会幼稚园的福建省、上海市、东北地区、广东省、汕头市、烟台市为例，分析教会幼稚园对当地幼儿教育的影响。

1. 福建省

关于近代开办最早的教会幼稚的有两种不同说法：

其一，在《福建史志》的“近代福建幼稚园发端试探”一文中指出：英国基督教长老会韦玉振牧师娘韦爱莉，于1898年在福建厦门鼓浪屿牧师楼创办幼稚园，后命名怀德幼稚园（即今厦门鼓浪屿日光幼儿园前身），这是外国教会在中国举办的第一所幼稚园。19世纪80年代，外国教会在中国沿海福州、宁波开始创办幼儿教育园所，以后教会办的幼稚园逐渐增多。^[38]该文作者陈毓洗、洪野本人，曾经在1992年至1994年先后调查林梁城先生（19世纪末幼稚生）、林舜英（早期毓英女校校友）、李淑仁（原毓英女校校长，为1859年毓英女校第一个学生的侄女）等人。

其二，据目前掌握资料证明，1900年以前，英美教会已在福建福州、漳浦、古田、兴化、漳州、厦门等地创办8所幼稚园，其中福州毓英幼稚园始创于光绪初年，创办时间最早，是近代福建第一所幼稚园。^[39]

笔者目前还无法对这两种说法进行考证。但是，这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都产生于福建，这至少可以说明一个问题，最早的教会幼稚园出现在福建。这可以说明教会幼稚园对当时幼儿教育影响的一个具体反映。

2. 上海市

根据“沪宁之幼稚园”民国七年（1918年）第一次调查，上海当时共有幼稚园十二所。民国十五年冬第二次调查，共有二十一所，二次调查表如下：

表4 上海幼稚园一览表(民国七年三月江苏教育会幼稚教育研究会报告)^[40]

校名	地址	开设年 月	现有男女生 数目	幼生 总数	保师 人数	后记
养真幼稚园	闸北长老会堂	约十余 年	男九女六名	十五 名	二人	平均每师保教六人 强
旅沪广东幼 稚园	北四川路	民国元 年	男六十女二 十七名	八十 七名	九人	平均每保师教二人 强
城西幼稚园	上海西门外小 菜场生生里	民国元 年	男四十五女 二十七名	七十 二名	八人	平均每保师教九人
启秀幼稚园	北四川路宝兴 路	民国二 年八月	男二十一女 二十五	四十 六名	二人	平均每保师教二十 三人
进德幼稚园	老北门外	民国二 年	男二十一女 十名	三十 一名	二人	教会设立平均每师 保教十五人强
兴华中西女 塾附设	老靶子路三十 六号	民国四 年正月		二十 五名	四人	平均每保师教四人 强
培真幼稚园	北四川路	民国四 年	男十三女十 二名	二十 五名	三人	教会设立平均每保 师教八人强
晏摩氏附设	北四川路	民国四 年	男十二女八 名	二十 名	三人	教会设立平均每保 师教七人弱
中国女塾附 属	蓬路太原坊	民国五 年	男二十一女 二十三名	四十 四名	二人	教会设立平均每保 师教二十二人
博文幼稚园	上海法租界贝 勒路	民国五 年	男十八女十 六名	三十 四名	四人	平均每保师教八人 强
清心幼稚园	南门	民国七 年	男二十女十 名	三十 名	三人	教会设立平均每保 师教十人
守真堂附设	北四川路			十余 人		教会设立

表5 上海幼稚园一览表（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广东公学调查报告）

校名	地址	开设年月	现有男女生数	幼生总数	保师人数	后记
养真幼稚园	宝山路宝兴 希里底	宣统元年	男五十 女四十 名	九十 名	三人	即第一次调查表中商务印 书馆所设立之养真，平均 每保师教三十人
上海城西幼 稚园	法租界篮维 葛路永福里	宣统三年	男十四 女十名	二十 四名	三人	会列名第一次调查表中平 均每保师教八人
上海广东公 学附设幼稚 园	闸北宝源路	民国元年 五月	男六十 二女三 十五名	九十 七名	十一 人	即第一次调查表中旅沪广 东幼稚园平均每保师教九 人强
中西女塾幼 稚园	汉口路二十 一号	民国三年	男二十 五女十 二名	三十 七名	二人	教会设立平均每保师教十 八人强
启秀女学附 属幼稚园	宝兴路十八 号	民国三年 九月	男三十 四女三 十五名	六十 九名	四人	会列名第一次调查表中平 均每保师教十七人强
中西女塾第 二附小幼稚 园	海宁路太原 坊	民国三年	男三十 二女二 十七名	五十 九名	二人	会列名第一次调查表中教 会设立平均每保师教十九 人强
广东旅沪郇 光学校附设 幼稚园	北四川路横 滨桥	民国七年	未详	五十 六名	三人	教会设立平均每保师教十 九人强
上海广肇公 学幼稚园	北四川路横 滨桥	民国八年 二月	男四十 四名女 十八名	六十 二名	四人	平均每保师教十五人
崇德幼稚园	白保罗路六 号	民国九年	男十九 女十六 名	三十 五名	二人	教会设立平均每保师教十 七人

中国近代教会幼稚园及其对我国幼儿教育的影响

沪江附属幼稚园	沪江大学内	民国九年	男八女十名	十八名	一人	教会设立
广肇女学附设幼稚园	横滨桥福德里	民国十年九月	男二十女二十三名	四十三名	三人	平均每保师教十四人强
群学会附属幼稚园	上海中华路小南门	民国十一年二月	男十三女十三名	二十六名	三人	平均每保师教九人强
伯特利幼稚园	西门斜桥南制造局路	民国十一年	男十四女五名	十九名	一人	教会设立
上海幼稚园	西门林荫路十八号	民国十三年	男八女三十四名	四十二名	五人	平均每保师教八人强
上海幼稚园	康脑脱路康乐里	民国十三年八月	男十六女八名	二十四名	三人	平均每保师教八人
西成幼稚园	西门蓬莱路西成学校内	民国十三年八月	男二十四女十八名	四十二名	三人	平均每保师教是十四人
培真幼稚园	上海徐家汇南洋大学内	民国十五年二月	男十二女八名	二十名	二人	平均每保师教十人
树基公学附设幼稚园	法租界贝勒路新天祥里	民国十五年秋	男十九女十六名	三十五名	二人	平均每保师教十七人强

清心幼稚园	上海大南门	未详	未详	四十名	三人	会列名第一次调查表中教会设立平均每保师教十三人强
		民国				
应陞幼稚园	东有恒路德裕里	十五年九月	男七女六名	十三名	二人	平均每保师教六人强
俾文幼稚园	南门	未详	未详	未详	未详	教会设立

表6 上海幼稚教育统计表^[41]

调查年月调查事项	幼稚园共述	教会设立者共数	男生共数	女生共数	男女生共数	保师共数
民国七年三月第一次调查	十二所	六所	二百四十四名	一百六十四名	四百三十九名	四十名
民国十五年十二月第二次调查	二十一所	八所	四百二十一名	三百三十四名	八百五十一名	六十名

从上列表格的内容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当时上海的幼稚教育学校的分布上，民国七年时（1918年），教会幼稚园同公立幼稚园的数目相当（均为六所），而民国十五年（1926年）的时候，教会办的幼稚园为8所，而公立的幼稚园为13所。从学生数目来看，第二次调查结果中的教会幼稚园的办学规模无论从入园学生总数还是保师人数，都有一个质的增加。第一次调查结果教会幼稚园的在园学生总数为160名，而第二次调查结果显示，教会办幼稚园的在园生总数为264名，从保师人数来看，第一次调查结果教会幼稚园的保师共有13名，第二次调查则约为14名。另外根据《上海市年鉴》及《宗教》杂志的上海市天主教会、基督教会办教会幼稚园统计^[42]，抗战胜利后，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上海市所办的幼稚园有：

表7 抗战胜利后天主教会在沪开办的教会幼稚园

旧校名	国别、教派	创办时间	人民政府接管后新校名	校址	改名时间	附注
一心初级中学	意大利天主教鲍斯高慈幼会					原名儿童教养院，后改一心初级中学。1951年8月由人民救济委员会接管。1953年8月停办
仿德小学	法国天主教拯亡会董家渡路天主教堂	1852年	董家渡路第二小学	董家渡路西街26号	1953年12月	1. 初名启蒙学堂，1935年定名为仿德第一小学，同时添设幼稚园。
震旦大学实验幼稚园	法国天主教震旦大学开办	1949年8月	长乐路小学		1953年10月	

表8 抗战胜利后基督教会在沪开办的教会幼稚园

旧校名	国别、教派	创办时间	人民政府接管后新校名	校址	改名时间	附注
慕尔堂第一小学	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慕尔堂	1938年	合肥路第一小学	合肥路11号	1951年10月	由慕尔堂一小、慕尔堂二小、慕尔堂幼稚园合并而成
慕尔堂幼稚园	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慕尔堂	1938年				合并于合肥路第一小学
儿童乐园	美国基督教布道会	1947年				情况不明
国际幼儿园	美国基督教国际礼拜堂		衡山路幼儿园		1953年10月	

通过上述史料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教会幼稚园在教育上海市当地的幼

儿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特别是在扩大招生范围和传播西学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 东北地区

1923年1月1日起,奉天省教育厅执行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新学制,号召城乡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兴办各类学校,以发展教育。锦县基督教会,鉴于东关施医院和育贤中学、小学校教职工和医院医务人员不断增加,为解决教职工和医务工作者的后顾之忧,于是在施医院筹建幼稚园一所——基督教立育英幼稚园。园址设在育英小学校内,由该校校长孔繁生(字雨春)兼任园长。聘请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岳幼樵夫人孙某和王雅彬为保育员。当时有儿童30人,大部分是基督教徒子女。常年办园经费为500元,多用于添置设备之用。课程设:识字、唱歌、计算、游戏等科。该幼稚园于1923年经锦县公署批准,报奉天省教育厅备案。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加紧控制基督教活动,后育贤、育英小学,由伪锦州市公署接管,育英附设幼稚园,也随之解体。^[43]

表9 近代中国东北主要基督教会幼稚园一览表

学校名称	创办人	校址	起	止
育英幼稚园	——	锦州育英小学校内	1924	——
辽宁省崇正幼稚园	——	安东大孤山	1912	——
青年会幼稚园	——	辽宁锦县	1929	——
临江幼稚园	——	吉林临江县	1934	——
四平幼稚园	——	吉林四平街	1946	——
吉林省文化幼稚园	邸如春	吉林高大夫医院院内	1925	1934
萃文幼稚园	——	长春西五马路	1918	1950
仁母幼稚园	——	哈尔滨西门脸	1926	1952
新民幼稚园	张海云	哈尔滨道里端街	1938	1952
黑龙江省明道幼稚园	贾晓山	佳木斯市安民街	1938	1945
崇俭幼稚园	刘殿和	哈道外北大六道街	1939	1952

黑龙江省基督教会为了解决信徒子女入托问题而创办教会幼稚园,为黑龙江的学前教育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尤以“仁母幼稚园”和“明道幼稚园”最为典型。1926年,西门脸信义会创办了哈尔滨第一个“幼稚园”,开始招收幼稚生20余人,1932年移交教会教育部直辖。每年可招收幼儿

70~80人,日本投降后有较大发展,定名为仁母幼稚园。至1952年接受教育局学前科领导,以后与教会脱离关系,由国家直接经营,原有工作人员成为哈尔滨托幼事业的先驱者。

1938年,基督教原浸信会牧师贾晓山等人创办了明道幼稚园,地址在佳木斯市安民街教堂。贾晓山兼任该园园长。幼稚园园名中“明道”二字,隐含明白基督教《圣经》道理之意。1938年末,办园经费由教会执事李宝安、曲寿笈各捐600元,购置黑板、积木等教具及用品。1939年初秋,开始面向社会公开招生。凡年龄在5~7岁间,没有传染病的儿童都可报名入园。每天上3节课,每节20分钟。实行半日制一班教学,学制为二年。该园的保障人员都是基督徒。没有统一教材,上课内容及教法由教养员自己安排。一般设唱游、故事会、自然等科目。另外还注意培养孩子的道德修养。这是佳木斯最早的幼儿园,1939~1945年共招收三期,入园儿童达90多人。

4. 广州市

据《广东地方史志》记载:1933年,附设在私立小学的幼稚园有16所(多数为教会办的小学),单独设置的私立幼稚园则有天真、东山灵光、广大路灵光、女青年会共4所,均由教会主办,在园幼稚生共760人。据《广州地方史志》记载:宣统三年(1911)九月,美国长老会碧卢夫人(Mrs. Biglow)开设私立慈爱幼稚园,园址在西关长老会内,为基督教幼稚园教育之始,其后各教派、会堂纷纷于小学内附设幼稚园,如真光小学、光东小学、明觉小学、提多小学、淑正小学、协和女中等都曾开设附属幼稚园^[44]。据统计,民国36年(1947)广州市立幼稚园仅为9个班,加上7所小学附设的12个班,一共才21个班,幼稚生仅为1203人。^[45]而教会单独设置的幼稚园有3所,分别是培灵(170人)、灵光(64人)、天真幼稚园(88人)、在校生达322人。另外,在提多小学、淑正小学内还附设有幼儿园。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广州基督教会对幼稚园教育的重视。由于政府一直忙于战乱,使幼教工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基督教会的工作无疑起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5. 汕头市

汕头市最早的幼稚园是石明道妇女学院附设的,其后市内又相继办了福音幼稚园(1917年英属基督教会长老会女会办)、真光幼稚园(1920年浸信会办)、引明幼稚园(1920年浸信会办)、普益幼稚园(1920年浸信会办)、新民小学附设园(1927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办)、若瑟幼稚园(1948年天主

教办),真光小学附设园(20年代办)、揭阳县真理幼稚园(1932年办)、宗光幼稚园(1939年办)、普宁县普光小学附设园(1940年办)、饶平县黄冈真道小学附设园(1935年办)^[46]。

6. 烟台市

教会在烟台市开办了如下的幼稚园^[47]:

(1)烟台西山幼稚园

1900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牧师郭显德夫人苏紫兰创办毓磺顶蒙养院,被认为是山东境内最早的一个幼稚园,每年招收幼儿约有六、七十人。1912年在美国商人史富兰、希医生(McMullan)、肯尼迪基金会和约克山庄长老会出资建成该幼稚园新校舍,美国籍教师梅女士(Annetta T. Mills)参加教学和管理。1913年迁新址,亦称西山幼稚园。据1913年美国北方长老会报告称,当时有幼儿93人。1919年,美国北方长老会牧师阿保罗夫人主持幼稚园工作。同年底,从美国实习回来的梅女士担任负责工作。1921年,该园转入同属长老会的信义小学,是烟台市最早的幼儿教养机构。

(2)信义小学幼儿园

1923年长老会委令教徒王静安接受成美小学,改名信义小学并附设幼稚园。

(3)烟台基督教女青年会幼稚园

1925年,烟台基督教女青年会在烟台市三马路创办了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烟台基督教女青年会幼稚园,女青年会总干事王秀卿负责幼稚园的工作。据1937年的统计称,该园有幼儿65人。日伪时期,幼稚园由倪谨负责,当时有教师4人、幼儿104人。1945年8月,烟台第一次解放后,该园划归南山路小学。

(4)烟台益文商专幼稚园(长老会办)

1931年设于烟台市新民村北,有幼儿20余人。

(5)烟台卫灵女校幼稚园(南浸信办)

园址设于烟台市大马路,校长为美籍传教士张宝灵,有幼儿20人,日伪时期停办。

(6)烟台爱光幼稚园(自立会办)

园址设于烟台西南关中华基督教自立会礼拜堂楼下,三十年代末停办。

(7)烟台培真幼稚园

烟台工艺会创办，时间约在1902年，在前几年收了大约40名儿童，其他情况不详。

此外，在中国的其他省份和地区，教会幼稚园也见分布，如在湖南省武陵地区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芬兰基督教湘西信义总会”于县城东半设立的福音堂，建幼稚园一所，1922年停办，1930年恢复开办，幼儿最多达40人。

“宣统元年山西育婴堂附设幼稚园，招收儿童一班，聘保姆一人担任教职，同时太吉县有教会设立之贝露女学校，亦创办幼稚园一所。”^[48]民国初年江西湖南山西河北等地幼稚园概况。江西省“至幼稚园自清末外人传教士来省创办学校，即以设立，惟彼时未受中国教育行政官署之统辖管理，故办理情况亦无从稽考。自民国十一年十一月，教育部公布新学制草案，其学校系统中，关于初等教育阶段者除小学校外，另有幼稚园，但为撙节经费设施便利计，多附设小学中。”^[49]

从我们例举的六个地区的教会幼稚园对当地教育影响的状况可见，教会幼稚园发达地区一是开埠口岸，一是殖民地或者租界地。正是在这些地区传教活动相比其他地区更为活跃，其教会教育也更为发达，这恰恰也说明教会幼稚园与传教活动的关系是无法割裂的。基督教会创办的这些幼儿教育场所，使大范围的幼儿在低年龄时就能接受近代西方的教育。

传教士的活动从整体上看是为殖民侵略服务的，但办教育与其它侵略活动不同，它有侵略的一面，也有与中国利益相交合的方面，一方面教会幼稚园充当了西方列强对近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工具；另一方面它亦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它为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把新的教育模式带到了中国。在中国兴办的教会幼稚园，有一个对中国国情适应问题，为此，教会做了一些有利于他们在中国办园的努力，这些努力为教会幼稚园本土化和中国人的模仿提供了参照。另外，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及社会对教会幼稚园办学的局限性、侵略性的反思，也对我国近代的幼儿教育改革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教会幼稚园在进入中国的百余年的时间里，虽然以宗教传播为主要目的，但是其相对教先进的教育管理模式，教育思想理念，科学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以及注重儿童身心发展，有计划的教育活动，注意儿童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比起清王朝的封建启蒙教育有些地方要先进。教会幼稚园有美丽的教室，小巧的设备，教材也有不少能使儿童感到兴味，儿童的活动有很大的主动性。另外，西方当时先进的如杜威以及福禄贝尔的幼儿

教育思想已经伴随教会学校传入了我国。我们承认实际上许多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华传教，都是抱着纯正善良的宣讲上帝福音的动机，与商务和政治并无牵涉。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教会幼稚园在中国开办是以战争为前提，以不平等条约为保护的，这是对我国教育主权的严重侵犯。同时，幼稚园开办的出发点是为了传播宗教服务的，为此我们一定要加以认识。

注释

- [1]田正平. 中外教育交流史[M],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第1页
-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info31802.htm>, 2008年2月15日
-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方网站
<http://www.moe.gov.cn/edoas/website18/info31802.htm>, 2008年2月15日
- [4]栗洪武.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思潮[M],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15页
- [5]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M], 第一册, 第54页
- [6]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M], 第一册, 第54页
- [7]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选集[M], 第592—593页
- [8]翦伯赞. 郑天挺 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M], 中华书局80年版, 第129页
- [9]朱有猷, 高时良.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M], 华东师大出版社, 93年第1版, 第26页
- [10]杨晓. 中日近代教育关系史[M],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年版
- [11]中华基督教会年鉴[M], 商务印书馆, 1914年
- [12]何晓夏. 简明中国学前教育史[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第132页
- [13]麦女士. 基督教女子教育,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M], 1904年第一期, 第81页
- [14]麦女士. 基督教女子教育,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M], 1904年第一期, 第81页
- [15]毓英——先驱者(英文版), 第47页, 基督教福州先驱布道团印刷所1939年版, 转引自 <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1004&index=95>, 2007年12月26日
- [16]毓英——先驱者(英文版), 第12、21、29页, 基督教福州先驱布道团印刷所1939年版, 转引自 <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1004&index=95>, 2007年12月26日
- [17]张宗麟. 幼稚师范问题, 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M], 第756页
- [18]何晓夏. 简明中国学前教育史[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第139—140页
- [19]陈毓洸, 洪野. 近代福建幼稚园发端试探, 《福建史志》[M],
转引自 <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1004&index=95>, 2007年12月26日
- [20]张宗麟, 雷震清. 幼稚教育中文参考书目, 教育杂志[M], 第十九卷第二号, 新刊介绍
- [21]易慧清. 幼儿教育史, 东北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教育系函授专科教材, 1989年6月, 第190页—191页
- [22]戴自俺. 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上卷)[M],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1994年6月第一版, 第447页
- [23]戴自俺. 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下卷)[M],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1994年6月第一版, 第1205页
- [24]戴自俺. 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下卷)[M],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1994年6月第一版, 第1205页

- [25]戴自俺. 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上卷)[M],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1994年6月第一版第447页
- [26]戴自俺. 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上卷)[M],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1994年6月第一版第447页
- [27]戴自俺. 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上卷)[M],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1994年6月第一版第448页
- [28]易慧清. 幼儿教育史, 东北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教育系函授专科教材, 1989年6月第190页—191页
- [29]戴自俺. 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上卷)[M],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1994年6月第一版第1205页
- [30]戴自俺. 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下卷)[M],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1994年6月第一版第1205页
- [31]环球[M], 第二卷第二期 1917年
- [32]戴自俺. 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上卷)[M],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1994年6月第一版第55—56页
- [33]基督教女子教育,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M], 商务印书馆, 1914年
- [34]舒新城. 中国幼稚教育小史, 教育杂志[M] 第十九卷第二号
- [35]戴自俺. 张雪门幼儿教育文集(上卷)[M],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1994年6月第一版第55页
- [36]张宗麟. 幼稚师范问题, 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M], 第756页
- [37]张宗麟. “幼稚师范问题”, 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M] 第764页
- [38]陈毓洸, 洪野. 近代福建幼稚园发端试探, 《福建史志》[M], 转引自 <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1004&index=95>, 2007年12月26日
- [39]陈毓洸, 洪野. 近代福建幼稚园发端试探, 《福建史志》[M], 转引自 <http://www.fjsq.gov.cn/showtext.asp?ToBook=1004&index=95>, 2007年12月26日
- [40]中国基督教差会年鉴, 1915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5, 第381—382页 广学会 1915年印行
- [41]中国基督教差会年鉴, 1915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5, 第381—382页 广学会 1915年印行
- [42]上海市私立学校统计表, 载《上海市年鉴》(教育), N21—23页
- [43]邹丹丹. 近代中国东北基督教教会学校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44]唐全贞. 民国时期基督教在广州的办学活动及影响, 广东史志[M], 广州出版社, 2002年第1期
- [45]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广州市志·教育志[M], 广州出版社, 1998年2月, 第19、38、69页
- [46]苏文纪. 近代外国教会在潮汕的办学活动及其影响, 汕头大学学报[J], 1997年第5期
- [47]烟台市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事务处, 烟台民族宗教志[M], 1993
- [48]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M], 商务印书馆(丙编), 第458页
- [49]教育公报[M], 第一卷(第一册), 第74页

参考文献

- [1]田正平. 中外教育交流史[M],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4年
- [2]中华基督教会年鉴[M], 商务印书馆, 1914年
- [3]张福娟. 特殊教育史[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
- [4]何晓夏, 史静寰. 教会学校与中国教育近代化[M],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年
- [5]何晓夏. 简明中国学前教育史[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
- [6]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M], 人民教育出版社
- [7]舒新城. 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M], 人民教育出版社
- [8]王忠民. 幼儿教育辞典[M],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4年
- [9]喻本伐. 中国幼儿教育史[M], 大象出版社, 2000年
- [10]丁致聘. 中国近七十年来教育记事[M], 商务印书馆, 1935年
- [11]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M],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5年
- [12]陶行知. 陶行知全集[M],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5
- [13]张宗麟. 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M],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5年
- [14]王建军. 教育交流取向和交流方式的历史思想——《中外教育交流史》读后,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J], 2006年第一期
- [15]袁运开, 叶澜. 简明中小学教育词典[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年版
- [16]李楚才. 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M],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7年版
- [17]杨晓. 中日近代教育关系史[M],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年12月版
- [18]王向远.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M], 昆仑出版社, 2005年6月
- [19]盛邦和.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史学卷)[M],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5年4月
- [20](俄罗斯)卡特林娅·萨里莫娃(美国)欧文·V·约翰宁迈耶 主编, 方晓东等译, 当代教育史研究与教学的主要趋势[M],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年7月版
- [21]卫道治. 中外教育交流史[M],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9年版
- [22]李建永, 董孟怀, 张丽双, 刘剑锋. 百年教育回眸[M],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0年
- [23]于沛. 史学理论卷[M], 兰州大学出版社
- [24]马啸风. 中国师范教育史[M],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
- [25]黄新宪. 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制度考略[M],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年版
- [26]朱有献.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一辑上册、第二辑上册、第二辑下册[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年版
- [27]张海鹏, 龚云. 中国近代史研究[M],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 [28] 栗洪武.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教育思潮[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年1月版
- [29] 王继平. 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9月版
- [30] 廖其发. 中国幼儿教育史[M],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年7月版
- [31] 李华兴. 民国教育史[M],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年8月版
- [32] 陈景磐. 中国近代教育史[M],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年3月版
- [33] 陈汉才. 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M],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8年8月
- [34] 刘秀生. 中国全史——中国清代教育史[M], 人民出版社, 1995年5月
- [35] 冯开文. 中国全史——中国民国教育史[M], 人民出版社, 1995年5月
- [36] 苏云峰. 中国新教育的萌芽与成长(1860—1928)[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年1月
- [37] 李正良. 传播学原理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M], 2007年1月第1版
- [38] 东方杂志(1904年3月—1948年12月)[M], 商务印书馆
- [39] 教育杂志(1909年1月—1948年12月)[M], 商务印书馆
- [40]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版
- [40] 中国学前教育史编写组. 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M],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年版
- [42] 陈振江. 传教士与晚清教育改革议, 南开学报[J], 1999年第五期
- [43] 齐春燕. 陶行知与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本土化, 成都教育学院学报[J], 2006年4月
- [44] 郑生勇. 教会学校对浙江教育近代化的影响, 浙江社会科学[J], 2004年5月
- [45] 王劲军. 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及其积极意义,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J], 1995年第一期
- [46] 张胜军, 王琰春. 教育本土化的多重涵义与分析, 教育评论[J], 2005年第七期下半月刊
- [47] 管伟. 观念的近代化与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启动——对中国近代化初始阶段的几点思考, 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 2004年10月
- [48] 郑飞, 黄小平. 论中体西用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江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J], 2007年3月
- [49] 刘少雪. 甲午战争前中国教育改革探析, 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J], 1998年第一期
- [50] 苏双碧. 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近代史研究[J], 1984年1月
- [51] 杨春华. 学前教育近代化的历程及启示,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 2003年11月
- [52] 田正平, 肖朗. 论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阶段的成就、特点与问题, 教育研究[J], 1998年第10期

- [53]郝振君. 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主要成就及经验教训,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 2005 年第二期
- [54]王惠来, 车宝英. 中国教育近代化简论, 教育探索 [J], 2001 年第 4 期
- [55]杨云兰. 论“新史学”视野下的中国教育史研究, 锦州师范学院学报[J], 2003 年 9 月
- [56]孙培青. 教育史学科未来的几个问题,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J], 2005 年 1 月
- [57]郭法齐. 什么是教育史研究——以外国教育史研究为例, 教育学报[J], 2005 年 6 月
- [58]杜成宪, 张继玺. 20 世纪关于中国教育史发展线索问题的探索,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J], 2001 年 12 月
- [59]张传燧. 外国学前教育引进与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学前教育变革,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J], 2007 年第 1 期
- [60]王杰才. 我国幼儿师范教育回顾与展望, 家庭与家教[J], 2007 年第 3 期
- [61]方玉芳. 清末幼稚园教育发展日本化透视幼儿教育[J], 2007 年第 5 期

致 谢

自古多情伤别离！校园里纯洁的玉兰花前几天刚刚凋谢，而满校园美丽的芙蓉花儿又像往年的这个时候一样开放。每年的这个时候，意味着又有一批学子即将踏出这个校门，走向自己另外的一个世界，而这一次，是我们！来不及感叹白驹过隙、光阴似箭，却又一次要和自己真真实实的学习、生活过的母校说再见了。在论文付梓之时，借此机会对所有曾经帮助过我的师长、亲人、同学、朋友表达我发自内心的深深谢意！

师恩永难忘！首先要对我的导师杨晓教授表示最深的谢意！清晰的记得三年前第一次来到这里参加完研究生复试的场景，先生带我去教育学院的资料室，使我看到了那么多优秀的教育著作，也使我更加清晰了自己读研努力的目标！在学术上，您是严谨、渊博的师长，带领我们走进学术殿堂。三年中，您不嫌弟子愚钝，耐心的为我解答每一个我学习中的问题，如果说我在学术上有一点点收获的话，我想这和您的谆谆教导，不厌其烦是分不开的；在日常的生活中，您倾注了太多的关爱，您总是像我一位尊敬的长辈，严厉但是慈爱，在我学业和生活中最为困惑和迷茫的时候，是您给予了我前进的动力和方向；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从论文选题、结构构思，到材料搜集、遣词造句，都倾注了您的悉心指导，可以说，没有您的关心指导，我的论文是完不成的！很幸运能够成为您的一名弟子，感涓涓师恩，情深意切，铭记于内，没齿难忘！

真的很舍不得离开辽宁师大教育学院这个优秀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有我厚德博学的老师，有我亲切热心的同学，这些都使我深深的爱上这里！首先要感谢学术渊博关爱学生的傅维利院长、德高望重的姚巨生书记、良师益友林忠伟副书记、和蔼可亲的蔡敏教授、严谨活泼的朱宁波教授、知识广博的谷忠玉教授、像兄长的陈英宝老师、外表严厉其实很热心的彭振威老师、我无话不谈的像朋友的乔冬老师，是你们对我在教育学院的学生工作的支持，才使我一步步的成熟起来，让我有信心面对工作中一切困难，拾级而上，在这里深深的说上一声谢谢你们！还要感谢像是我可亲可敬的大姐姐一样的邹晓燕教授，您是我学术上的师长，生活中的朋友，师恩将永记于内；感谢张桂春教授、张奇教授，是你们渊博的学术、生动的授课使我在知识上受益匪浅，同时使我更加热爱我所从事的教育事业。

感谢我的同学王波、赵海涛、曲军波、张新科、余丽源、李红艳、黑丽君、蔡新颖、李艳阳、赵志峰、乔江艳、秦宏大、李艳、周丹、竭婧，你们有的是我生活中无话不谈、使我摆脱困惑的朋友，有的是和我一起为学生工

作而尽心尽力的伙伴，有的是我学业和生活中帮助过我很多的知己，在这里对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还要感谢的是研究生院的唐书文老师，我的师兄邹巍博士、董光恒博士，师姐田春玲、李贞、程燕、赵赟，你们在我的学业、生活、和学生工作中帮助了许多，师长、学长之情终生难忘。

感谢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牛晓牧教授，在这里对您在我学业生活中的帮助使我深表谢意。以及我本科的同学陕西师范大学的孙丽华、本科宿舍的河北大学的程绍仁、浙江大学的李志永、呼伦贝尔学院的付刚、东北师范大学的梁祝松，你们在我的毕业论文资料的搜集，论文的写作，生活中的困惑的帮助，使我深深的感受到同学之间的情义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感谢同门的李红艳、于潇、吴涛同学，是我们并肩一起走过了读研的风雨历程。同时感谢和我朝夕相处的室友王波、崔义厚、何明远，我们一起营造的温馨、积极、快乐的环境是我学习生活中温暖的港湾。

在我求学的过程中，是我的家人的关爱和支持才使我安心于学业，感谢我的父母、姐姐和姐夫，我想说的是，你们永远都是我最心爱的人！我爱你们，我爱我们的家！

包 锋

2008年5月11日于辽宁师大